

# 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姓名研究

赵苏顿色日乐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8)

**摘要:** 每个民族社会人使用的国际通用民族姓名符号既是表明每个民族社会成员彼此间或相互关系的必然联系形式和具体可被识别的程度等的社会唯一文化标志符号,它自身还往往隐含着和反映出其社会成员以及本地域的该民族、本地区人独有的各种特定文化历史、语言、习俗、宗教信仰、世界观、族际民间相互交往与行为举止等方面诸多历史信息,具有可指代性符号性的丰富性多和符号时代性的强性等特征。本文重点介绍从研究民族地区姓名起源中的历史人文本质、姓名起源后的姓氏文化历史演变发展历程以及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相关轨迹分析等这几方面来详细系统地解读了姓名文化,从而展现出处于多元文化文化背景下的蒙古族人民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又顺应发展,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文化后产生的文化研究。

**关键词:** 民族地区; 姓名; 多元文化;

## 姓名是文化符号

姓名通常是指某一个人特有的文化符号。它又蕴涵着更丰富多样的中国社会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人类文化历史的一重要精神组成部分。在西方世界及当前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一体化经济生活中的这个特殊历史民族环境体系构成中,每个民族主要的民族地区及独特鲜明的历史民族姓名文化符号等都是应当赋予属他族自己的特定鲜明的地方文化民族特色,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积极适应主流文化的发展。姓名是社会成员相互联系和识别的语言符号。它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和变化,反映了宗教信仰、两种世界观、风俗习惯、语言等,记录了其民族地区的历史、民族交流等信息。研究他们的姓名将有助于了解他们的民族心理、生活习俗、历史和文化。

人类学对姓名的特别关注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埃文斯-普理查德对努尔人的研究则指出,姓名在努尔人社会中不同仪式场合的多重形态,不仅是姓名的一种分类性的体现,实际上也发挥了社会协调的功能。同埃文斯-普理查德一样,列维-布留尔<sup>[1]</sup>也强调姓名同社会关系之间的某种联系,但列氏认为,对于二者而言,实际上是姓名对社会关系起到了更多的影响作用<sup>[2]</sup>。

人名作为社会成员的象征,像棱镜一样,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信仰、心理和审美情趣,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社会现象、历史特征、时代、民族关系、文化进程等的真实情况,也是社会和文化的象征。对姓名的研究可以揭示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变化。因此,姓名的文化资源对于人类学的工作者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蒙古族人名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不难发现,蒙古族人民自诞生以来,从未停止过与中国部落、民族和文化的交流。粗略地观察蒙古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人们会强烈地感觉到,蒙古族姓名文化不仅有自己的文化遗产,而且总是开放和吸收周围的群体和民族文化因素,进一步丰富、完善和融合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体系。因此,蒙古族姓名文化的变迁过

程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国各民族的民族关系。本文以科尔沁左翼中旗为田野点作了分析。科尔沁左翼中旗,简称科左中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位于内蒙古、吉林、辽宁交界处的金三角,隶属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是个多民族聚居的民族地区共有蒙古族、汉族、蒙古族、回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等 15 个民族。科左中旗总面积 9811 平方公里,人口 53.7 万,农牧业人口 44.9 万,其中蒙古族人口 39.5 万。它是中国县级地区蒙古族人口最多的旗县。

## 多元文化的融合

### 吸收佛教文化

13 世纪中后期,梵文和与佛教有关的梵文姓名通过维吾尔语和藏语直接传入蒙古族社会,使原始蒙古语姓名吸收了藏传佛教文化元素。根据历史记载,藏传佛教(黄帽教,或喇嘛教)在 16 世纪下半叶受到蒙古统治阶级的青睐。从明朝北元与明朝的对峙、蒙古上层阶级的内讧,到清朝——蒙古族统治者“黄教服从蒙古”的软而怀柔政策的实施过程,再加上蒙古上层社会以各种法典确定的喇嘛教和上层僧侣的法律统治地位,藏传佛教与蒙古社会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sup>[3]</sup>。在藏传佛教多年的影响下,当时的蒙古族人民的姓名中便能体现出蒙古文化引用了藏族文化元素,其中重要见证和反映蒙藏关系的是蒙藏命名。例如,多里吉(金刚)、甘卓尔(秩序与权威)、扎西(吉祥)、巴拉吉(佛陀赐予)、桑吉(佛祖,觉醒)、塞珍(长寿)、德吉(平安与幸福)、尼玛(星期日出生)、黛青(极乐谷)、珠乐(佛堂供灯的意思)等。

从清朝乾隆时期到至今,蒙古族人民信奉藏传喇嘛教的历史已有数百年,整个民族都在虔诚和信奉。从科尔沁左翼中旗的藏族名称的语义和数字分析来看,蒙古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一直在变化和发展。作为文化的另一面镜子,姓名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自清末,汉族移民入内蒙古,姓氏也在蒙古人之中出现。最开始出现姓氏的主要原因是蒙古族人民需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科尔沁左翼中旗是内蒙古民族地区是最早开始运用姓氏简化的一批人之一,

即姓与名并用的地区。该地蒙古族都有汉姓,“我们老包家”“我们老白家”这种姓氏的介绍也经常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被提到,因此,他们的姓氏与名字往往把汉姓与人名并用。

#### 吸收汉文化

语言的相互影响和语言的相互学习是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最大和最直接的表现。即民族语言是姓名的另一种表达形式。科尔沁左翼中旗是个多民族聚居的民族地区,在这种环境下,蒙古族人民的经济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教育和文化相互影响、互相借鉴。蒙古族人民与这些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一起。牧区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在混合民族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和改变。作为文化的一面镜子,人们的姓名也必须受到影响。

现如今,在中国的大部分蒙古族民族地区,有大量的蒙古人用汉语命名。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反映了蒙汉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姓名文化的文化融合与互补。如:海虎、山虎、青山、金柱、银柱、国梁、李英杰、金荣、银泉、满泉、双柱、赵文志、双全、双山、陈宝柱、吴全福、吴桂林、双山、杨海林、杨国林、晓峰、银峰、宝泉、连锁、银锁、双喜、七斤半、双月、九月、金荣、桂兰、金宝贵、来喜、国英、玉宝、玉柱等等。

蒙古语名字主要用于家庭内部或使用蒙古语的语言环境中,甚至一些人的蒙古语名称也仅用作昵称。这主要由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所影响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地理位置的接近使其与各民族相互交流和引用,这是蒙古人用汉语命名的最直接的原因。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各种文化因素和人类精神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文化传播、创造和发明、生产方式结构、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社会制度的调整等重大变化都是社会变革的原因。蒙古人姓名的汉化是现代蒙古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的直接结果。

#### 结语

姓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姓名不仅是一种语言符号,而且在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中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谈到民族大融合,我们又必须着重谈谈民族历史基础上重建的新民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根据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结构”,如中国北方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生产的方式和中国汉族古老的游牧农业及其生产方式,他们“相互交流,交换需要的东西,并根据国家自身的需要,逐步形成具有分工性质的供求关系。尽管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战争和几次重大分裂,但各民族的经济交流从未停止,始终相互依赖。”

总之,蒙古族人民的服饰、饮食、生活等民俗文化反映在蒙古族人民姓名中,具有鲜明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特征。虽然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习俗已经逐渐改变或消失,但一些习俗,如饮食和服装习俗,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相结合,共同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习俗和文化。

姓名是社交的产物。在不同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中,姓名的调整自然首当其冲。20世纪,历史将处于边缘地区的蒙古族置于中心,

从而将其置于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中。尤其是异质文化的力量极其强大,导致蒙古族人民陷入了维护传统文化和承认异质文化的历史困境。正是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蒙古族人民的姓名积极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实际交流需求,例如简化音节以便于交流,并通过吸收异质文化中的积极元素不断提高自己。这一切都是在与异质文化即儒家文化的对话中实现的,在内容上内化了儒家文化,在形式上植根于蒙古文化。

费孝通先生认为,汉族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一体格局中是一个凝聚的核心,它不断融入新的血液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1],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存在,构成了中华民族这个统一体。蒙古族作为“多元文化”的一分子,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核心体系,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成为“一体”是历史的必然。蒙古族姓名的历史演变虽然这只是从其中一个简单侧面来验证反映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来的一个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一体格局概念的初步形成过程,却为中华民族的融合作了很好的诠释,成为民族融合的历史镜像。蒙古族姓名的历史演变虽然这只是从其中一个简单侧面来验证反映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来的一个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一体格局概念的初步形成过程。

#### 参考文献

- [1] 祁进玉,孙晓晨.取名方式变迁与多民族文化交融——以20世纪上半叶鄂伦春族为例[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64-72.
- [2] 韩得福.多元文化文化视域下撒拉族姓名文化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5(1):120-124.
- [3] 吴芳.姓名的跨文化研究[D].广西:广西大学,2002.
- [4] 杜攀.跨文化交际视野下中英姓名符号的对比研究[D].湖北: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10.
- [5] 徐斯日古冷.语言象征意义对于民族关系的影响[J].北方民族大学(下旬刊),2014(1):153-153.
- [6] M. Mauss, “A Category of Human Mind: The Notion of Person, the Notion of Self”, in M. Carrithers, S. Collins and S. Lukes (eds.), The Category of the Person: Anth
- [7]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8]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9] 特木尔巴根,吴灵芝.从蒙古族人名变迁看民族文化的融合[J].中国民族,2010(12):54-55.
- [10] 左振廷,李金兰.个体、家族与社会:关于跨国苗族Hmong人的姓名人类学探析[J].凯里学院学报,2021,39(04):18-28.
- [11]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C].华夏出版社,2004年.